

報道：本刊 張佩莉  
攝影：本報 陳來發  
部分圖片：郭義民提供  
歷史資料：轉載自《越洋控訴》一書

本周專題

## 父親在我8歲時 離開……

父親在我8歲那年離開後，媽媽帶我們搬到新山。雖然父母離婚了，但父親每年除夕都回來，帶我和弟妹去叔叔姑姑的家過年，吃團圓飯。

那時候，母親身兼數職，因為是單親家庭，壓力大，她脾氣比較暴躁。我從小就很渴望父親回來，他有張長得像菩薩的臉，他的笑容，他的談吐，他的閱歷，他有时候會輕拍你的肩膀，那感覺非常好。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時間，我們談國家大事、談海南人文化、談郭氏族譜等。從母親那里我得不到這樣的感覺，她大部分時間不在家，她也只有小學學歷。

父親對我影響最大的地方，是他讓我對社會工作產生濃厚的興趣。我在12歲填寫志願的時候，律師只是第二志願，社會工作者才是第一志願！

我從來沒有恨過父親。我對他的印象是多重的，多面的，不單單只是一個父親。自我懂事後，他就沒有和我們住在一起過，雖然我有重要事要跟他談的時候，他都會跟我談，可是那種感覺，就是不一般家庭里孩子和父親的感覺。他，比較像是一位我尊敬的長輩。

直到父親處理峇冬加里冤案時，我才有機會認識他，而真正認識他，是在他過世前的一個月。

## 每一代都有人想要翻案……

2008年，父親打電話找我，因為他要寫備忘錄，要寫布條。他的華文造詣非常高，但他要給英國專員寫信時，他就想到我。當時，我認為他不適合當領頭羊，去處理一個在當時看來根本看不到結果的案件。

2003年時，我曾經陪他到廣州換腎。回來後，他酒還是照喝。他就是那麼一個樂天的人，不會為了長壽和健康犧牲喝酒的樂趣，結果代價就是身體越來越弱，雙腳行動也不太方便。

但他一路來都很固執。他追問我法律上的問題，得到他要的答案後，他就蓋電話。他不理我。從報紙上，我看他呈了備忘錄，過後，他把資料給我，叫我參與。

對父親我還是有点怕的。小時候，有見過他发脾气，声音非常宏亮，听到他喊你的时候，你会发抖。所以当他坚持己见的时候，我总是会照他的意思去做。

2008年3月尾，父亲呈交了备忘录后，要我参加平反行动。我参考了大量文献，结果越看越愤慨，终于理解父亲不是没事找事做。

当时最重要的文件是1970年英国《人民周报》的报道，报道采访了8名士兵，有6名承认是冷血屠杀。这是最强而有力的证据，可是过后不了了之，真相一直没有被揭发。到了1993年，站出来的又是一个记者。每隔十几年，都有人站出来，不为什么动机，只是为了揭发真相。像我的父亲，他也算是半个媒体人，他也是义不容辞地站出来。

我会体会到一点——每一代都有人想要翻案，找出真相。我这一代，也应该这样做。我这一代做不到，我的下一代还会去做。

我专攻法律，父亲则搞社会运动出身，他有他的特长，他有他独特的观点。有时候我觉得为什么一直要开记者招待会，但他很坚持，他认为搞社会运动就需要这样！



## 父親像菩薩那樣的微笑……

2009年下半年，父親的情況越來越壞。11月尾，他听从医生指示，入住士拉央医院。不久后，他进行了切除白内障手术，同时也因为脚板有脓，流血不止，导致伤口无法愈合而必须截肢。

他情绪低落，但还是高度关心案子。我尝试撤开案子，跟他谈其他课题，包括佛教，也跟他商讨出院后要做什么。他说要出书，跨越几代人的悲剧，国内外却没有完整的文字记录，父亲一直深感忿忿不平。那阵子他相当无助，我告诉他说，你的强项是写作，脚没关系，只要脑袋清楚，手还好好地，就ok了。他才67岁，应该可以多活几年的。

我在医院扮演的角色相当大，他对太太发脾气，我就鼓励他，告诉他还有很多事可以做。我放下工作，在医院陪他，医生的话，都由我做翻译。那时候我们的感情非常好。我很怀念那段日子。

过去的4年，平反峇冬加里案件牵引出我们父与子的亲情，4年来的高潮，就是在士拉央医院的一个月，它让我真正了解父亲。

2010年1月1日晚上，母亲上来，我去见了她。我也受邀参加陈凯希（工委会发起人暨执行顾问、赞助者）的晚宴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说我要回去医院。当时父亲已经转到中央医院了，我去看了他，还等到医生来，医生说没事，然后父亲对我笑，像菩萨那样的微笑，非常和蔼可亲。他叫我回去，我就回去了。半夜两点多三点，他太太打电话来说，他过世了。

## 我相信 他在九泉之下是欣慰的

其实我是自责的，为什么我没有请最好的医生治疗他？！人已逝，我唯一能补偿的是完成父亲的遗愿。

父亲晚年的心血全放在峇冬加里屠杀惨案。担起这个工作，无关个人荣誉，更非追名逐利。因为秉持追求正义的信念，他宁可放弃悠闲的退休生活，不辞劳苦，四处奔波，到处请托要求社团组织及达官贵人支持，连身边的亲友，都被他拉来一起协助工委会的工作。

去年我们去伦敦，出发前我到墓园跟他汇报，法庭判决后，我也跟他汇报。我相信他会觉得欣慰。当初没有人敢奢望有好的成绩，今天法官判决村民没有武器、没有逃跑，他们是平民，官方说法不正确，这就是最大的成果了。

把《越洋控诉》这本书出了，也是给父亲的一个交待，这书出版后的悉数收入，将用来建设与维持罹难者纪念碑。

